

·地域文化与阅读推广·

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 ——从《苏州藏书史》到《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

张思瑶

(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 南京 211816)

〔摘要〕 本文通过对叶瑞宝主编的《苏州藏书史》和曹培根所著《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的对比阅读,概述了两部著作的知识内涵和学术价值,指出了两书的贡献在于全面地总结了苏州藏书文化的璀璨成就,对于继承和弘扬苏州藏书文化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

〔关键词〕 苏州私家藏书 藏书文化 《苏州藏书史》 《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52.1

〔引用本文格式〕 张思瑶.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从《苏州藏书史》到《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J].图书馆,2017(11):29—32

苏州,自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建城,到如今已有2500余年的建城史。纵观苏州一地的文脉历史,以科举人才和书籍资源为两片人文亮色。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使得苏州城乡藏书、读书、教书、刻书、著书之风历劫不废,造成人才辈出的局面。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对苏州藏书史和苏州文化之间的关联性研究有所不足,使人难以从整体上来认识苏州藏书在整个中国藏书文化史上的作用、地位和影响。为此,先后有苏州图书馆研究馆员叶瑞宝先生主编的《苏州藏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常熟理工学院教授曹培根先生著作的《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广陵书社2017年版)问世,填补了上述学术研究的空白。

1 《苏州藏书史》与《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概述

《苏州藏书史》分为四章,全书近四十万字。是叶瑞宝先生主持的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成果。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成员通览了苏州府、县、乡志等地方文献,有关的书目、题跋记,爬梳资料、查证补充,完成了这本著作。

本书前言首先提出“苏州藏书史是吴文化学和历史学的交汇点”^[1]的观点,接着提纲挈领地介绍了苏州的藏书历史,并从地理环境、历史源流、经济情况以及书业概况分析了苏州成为我国藏书中心的原因。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分别介绍了苏州学校藏书、寺观藏书和私家藏书的情况,其中寺观藏书和私家藏书按词条形式列出名目,书后有索引,书前有凡例,方便读者查询。不过由于资料匮乏,且苏州历史上并非都

城,所以官府藏书仅在前言里有所介绍,后面未分独立章节。

如果说《苏州藏书史》是对苏州一地的藏书情况作概略式的综述的话,那么《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便将目光聚焦在了苏州的私家藏书文化。

《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共分三篇,依次为“苏州藏书概论”“苏州藏书世家”和下篇“苏州藏书家传”。全书有二十七章,计72万字。这是曹教授埋首故纸堆,潜心史料库,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的课题研究成果,该项目旨在“以中国藏书文化、吴文化一个典型范例的文化样本来进行剖析研究”^[2],书写一部研究苏州藏书文化的学术专著。

为此,作者带领课题组成员围绕苏州当地的藏书历史、藏书流派、藏书理论、藏书世家、私家藏书刻书、藏书目录、私家藏书楼、私家藏书与文学艺术及其他藏书系统的关系、传统藏书文化的保护与利用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挖掘苏州藏书历史和文化的丰富内容,系统展示了苏州一地自南方夫子言偃始,下迄近现代的私家藏书脉络,搜集丰富的资料,补充苏州地方志等其他文献中的记载和数据,共统计得839名苏州地区藏书家(含流寓苏州者),并为之撰写小传,使得本书更添工具性资料书之效用。

结合《苏州藏书史》和《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我们既能从宏观上对整个苏州地区的藏书情况有全局性的把握,又能在微观上对苏州私家藏书在整个中国

藏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有较为细致的了解,并能从对两书的对比阅读中看到苏州藏书文化研究的发展以及梳理苏州的藏书文化成就。

2 两书对比看苏州藏书文化成就

2.1 四大藏书系统构建完整苏州藏书图景

藏书研究多偏重于私家藏书,而忽略对其他藏书系统的研究。《苏州藏书史》认为要研究一地藏书史,构建一个全面的,包括官府、学校、寺观和私人藏书都在内的藏书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苏州历史上并非政治中心,因此相关资料较为匮乏,但自秦至清末,苏州的各级各类官府均设有藏书之所,府县皆设有书房。宋代开始,历代苏州的省级机关不仅藏书,还进行刻书活动,无疑充实了官府藏书。叶瑞宝更将苏州官府藏书追溯至公元前512年,认为孙武向吴王阖闾进呈的兵书应藏于吴国策府,这可看作是苏州官府藏书之始^[1]。

崇文重教一直是苏州的传统,有学校便有藏书,有藏书才能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促进教育的发展。叶瑞宝将学校藏书分为苏州府、县学校藏书和书院、义学、社学藏书,考察总结了包括苏州市及所属吴县、长洲、常熟、昆山、太仓、吴江六县(市)的学校及其藏书记载情况。

寺观藏书方面,《苏州藏书史》重点关注了寺观所藏佛道经和释道个人著作情况,并总结了苏州寺观藏书的特点,分别是最早应用雕刻技术,藏有价值极高的血经,所藏经帙研究价值高等,并整理了苏州寺观藏书名录。

私家藏书情况在《苏州藏书史》内相对较为简单,这点在《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中得到了弥补,并且后者还对私家藏书与官府、学校和寺观藏书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总结,认为私家藏书与其他藏书系统联系紧密,并起支撑作用,是其他三大系统藏书的主要书籍来源^[2]。

到此,苏州一地的藏书历史呈现出较为完整的状态,由官府藏书、学校藏书、寺观藏书和私家藏书共同构建的苏州藏书盛景得以呈现。

2.2 藏书文脉源远流长,苏州私家藏书发端前推百年

要追溯一地藏书风气的发端,必考察该地四大系统,即官府藏书、学校藏书、寺观藏书和私人藏书的情况。苏州私人藏书风气兴盛,藏书人才辈出,但这股风气的发端却呈现出不同的观点。《苏州藏书史》中论述春秋时期的常熟言偃是苏州私人藏书家最早之一仅是

推理,叶瑞宝等人对比了《藏书纪事诗》《吴中藏书先哲略》等史料文献,认为南朝陆澄(425—494)为苏州最早的藏书家^[1]。这个情况在《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中有所改变。

曹培根认为常熟言偃北上求学于孔门,位列“孔门十哲”,后将孔子学说传播于吴地,确为“中国南方最早的文献传播者和藏书家”^[2]。并在中篇“苏州藏书世家”的第一章“言偃文化家族”中,细致梳理了言偃的生平成就及其家族的后续发展,认为言偃南下传播孔学,必有丰富藏书,从而“使孔子之道渐于吴,吴俗乃大变,千载之下学者益众,家诗书而户礼乐”^[2]。

自言偃之后,苏州藏书家不断。东汉以后,苏州出现了朱、陆、张、顾等藏书世家。朱氏以朱买臣为代表,其在穹窿山下的藏书之地成为了苏州藏书镇的名称由来。陆氏藏书以陆澄为代表,张氏藏书以张率为代表,互通书籍。吴郡顾氏也多藏书和著述。隋、唐以后,陆氏、张氏藏书仍继承延续,更有皮日休、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任职苏州,倡导文教,藏书不绝。宋、元时期,除本地藏书家外,继续有外来藏书家在苏州安居乐业,聚书不辍,发展和丰富了苏州的藏书文化和历史。

明代中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苏州一带的藏书家们带来了新的机遇。藏书家们的藏书经过了数代人坚持不懈地递藏后,更促进藏书家进入刻书领域。虽然明末时的战乱对苏州地区的藏书事业造成了伤害,但并未持续多久,到了清初,不但逐步恢复还渐渐形成了苏州的藏书特色,并最终形成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藏书流派。清代中期,乾嘉学派的考据需求也为苏州藏书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在藏书、编目、校勘、刻书等方面更加追求审慎的严谨之风。

综观千余年来的苏州藏书历史,会发现苏州书香文脉的延续和发展,与其开放的藏书理念关系紧密。私家藏书不仅促进了苏州当地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更与其他系统(官府、书院、寺观)藏书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当地崇文重教,重视读书与教育的地区文化。

2.3 藏书家数量众多,藏书世家联系紧密

《苏州藏书史》中的“苏州私家藏书”章节,在概述之外,列出私家藏书名录,以条目的方式介绍苏州地区的私人藏书情况。这些私家藏书的资料和信息到了《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中获得了更加详细的介绍,并以家族为中心聚合,挖掘出藏书世家对于苏州藏书

风气的引导和延续的影响。后者共统计得839名苏州地区藏书家(含流寓),并为之立小传,体现了历史上苏州藏书人才济济,揭示了苏州之所以成为藏书中心的原因。而众多的藏书家,除了与苏州当地优越的自然环境,宽松的政治氛围、发达的经济情况以及出版发行技术的普及以外,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以诸多藏书世家的共存与延续为特点而塑造的苏州当地的藏书文化特色。

藏书一事不仅有助于自身的求学、成人,其本身的风雅以及对后代的诸多滋养,促使士林阶层彼此应和、效仿,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藏书世家。《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中篇“苏州藏书世家”十六章,分别介绍了言偃文化家族、叶氏藏书世家、文氏藏书世家、赵氏藏书世家、钱氏藏书世家、毛氏藏书世家、徐氏藏书世家、席氏藏书世家、黄氏藏书世家、汪氏藏书世家、张氏藏书世家、陈氏藏书世家、瞿氏藏书世家、翁氏藏书世家、顾氏藏书世家和潘氏藏书世家。以家族为据点,溯及世代,深入研究这些藏书世家的来源与流向,关注书的同时更关注书人。

江庆柏总结近代江苏藏书的一般特点时,曾提出“藏书家之间的多重联系”,认为“近代苏南的藏书家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行动,在他们的藏书过程中,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支持,藏书家之间以亲属、主宾、师生、朋友为纽带,建立起非常亲密的联系”^[3]。这个特点在苏州藏书世家的身上尤为明显,并且事实上,这个特点不仅仅存在于近代的苏南藏书家身上,在整个苏州的私家藏书史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家族之间往往有所交集,形成网络,如张率与陆少玄互通书籍,共同撰书;何大成娶赵氏脉望馆赵琦美之妹为妻,夫妇同为藏书家;陈揆与张金吾为“藏书二友”;叶昌炽帮助潘祖荫整理藏书,并因此得到了阅读潘氏藏书的机会……这些都构成了一定层面上文化圈的“互著”,使得苏州的整个藏书图景跃然纸上,非常生动。若是一家衰败,藏书流出,别家则努力护持、收藏,较少因藏书不利而损毁,体现了文人对书籍通性的热爱。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与浙东派藏书相比,虞山派的藏书家们更愿意将好书佳刻共享,而不是将收藏秘而不宣。

2.4 藏书流派及理念影响深远,学术成果嘉惠士林

书籍日丰,则藏书者益多;藏书者益多,彼此交流往复间,必会由于相同或相异的理念和爱好形成不同

的圈子和类型。明代胡应麟(1551—1602)被认为是最早对私家藏书进行分类研究的学者,其借用宋人对画家分类的方法,将藏书家分为好事家、鉴赏家,此以藏书家对书籍的不同方向的重视为区分标准^[4]。后又有洪亮吉、叶德辉、缪荃孙等人对私家藏书的特点做出各种分类。古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志同道合的人易相聚成群。以藏书而言,持相近藏书理念的人聚集于一地,自清代顾广圻(1766—1835)开始,提出了藏书的“常熟派”之说,推常熟钱遵王、毛子晋父子为代表^[5]。后来赵万里提出藏书“苏州派”的说法,王红蕾提出藏书“嘉兴派”的学说,都是对地域藏书特点进行总结。当代学者黄裳曾谈到“虞山(常熟)派”和“浙东派藏书”的区别,指出前者重视版本,后者则重视当代史料、地方文献等^[6]。

“虞山(常熟)派”作为苏州一地私家藏书的代表流派,影响广泛而深远,其与“浙东派藏书”的不同,最显著处当有两点。一是虞山派好古,更重视版本佳刻,重视从书籍的外部特征去分析该书的流转和版本的优劣,以此作为收藏价值的考量。而浙东派则好用,更重视乡邦文献、强调实用,偏重与今,着眼于史。二是浙东派藏书更重视“藏”而虞山派藏书则更倾向于将私藏共享。

“重藏轻用”一直是形容我国古代藏书文化的常用总结,但这个总结在面临苏州地区的藏书文化问题上,可能并不那么合适。苏州藏书家们的藏书思想以“藏书致用、流通古籍”为主导,认为藏书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保藏珍贵的书籍,还应该服务于教育,重视书籍的使用,乐于并擅用抄书、刻书等方式将优秀的书籍进行彼此交流和扩大影响,更重视通过自己的收藏来进行研究和分析,从而产出学术性成果,如著述、编制藏书目录、进行题跋和校勘等。

张率与陆少玄互通书籍,共同撰写《佛像杂铭》;陆澄凭借自己的藏书编成一百四十九卷《地理书》;沈周领袖“吴门画派”;钱谦益著述甚丰,除《历朝诗集》外,还有《周礼纂要》《大方语苑》《明史断略》等;许元溥与黄宗羲约为抄书社;丁祖荫汇编《虞山丛刻》。更不必说毛氏汲古阁以刊书为急务,席氏扫叶山房刻书延绵二百五十多年,影响甚巨。张金吾、瞿氏等人耗其心血编制藏书目录,黄跋顾校为藏书界竞相收藏,不仅为后世还原了我国古代书籍的面貌,更为版本学、目录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苏州藏书家们还在藏书实践活动中,总结、

提炼了若干藏书理论,如孙从添的《藏书纪要》提出藏书“八则”,分别为购求、鉴别、抄录、校雠、装订、编目、收藏和曝书,黄丕烈评价其“甚详且备,盖亦真知笃好者”;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开中国历史藏书研究先河,影响了后代学者对书林故实的研究,以及叶德辉《书林清话》的写作。

2.5 藏书楼作为区域学术中心作用显著

宁波范氏天一阁名扬天下,北京故宫文渊阁阁制甚至仿自天一阁。但与天一阁不许外人登楼不同,苏州的藏书楼不仅成为开放的区域学术中心,更因其园林式的建筑风格和文脉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藏。苏州藏书家在建造藏书楼时,除注重藏书的通风性、湿度适宜、防火性能以及避免鼠、蚁、蠹鱼和霉变外,还注意以园林的元素如水池、岛屿、花木等来营造优雅的氛围^[2],并以此来吸引文人学者交流唱和,如赵氏旧山楼的主人赵氏兄弟将旧山楼作为文人墨客雅集场所,瞿氏铁琴铜剑楼持续开放,接受文人交流、阅览和抄录等,客观上促进了苏州当地的文化发展。

3 结语

“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这是唐朝诗人韦应物(737—792)在苏州刺史衙门里,与文人士子们雅集饮宴间所咏之句。诚然,苏州文脉历劫千年而不绝,与此地藏书、著书、刻书的文化风气是分不开的。

苏州作为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中心以及书业发达之所,对其藏书文化的研究应倍加重视,以其经验启发他方。《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无疑是继承了

《苏州藏书史》研究的精华,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观点,并扩大了苏州藏书文化研究的视野。不仅关注苏州私家的藏书文化史、藏书流派和理论、藏书家著书、刻书和编制藏书目录等的概况,还将目光扩展至对苏州本地藏书与其他区域藏书的比较、藏书楼名宅的建筑文化以及藏书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上,加深了苏州藏书文化的研究层次,提出了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苏州藏书史》和《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二书立论严谨,资料宏富,不仅可作为了解苏州一地藏书文化和历史的上佳读物,也兼具工具书的诸多效用,还可与许多藏书史上的名著佳作配套阅读,如孙从添《藏书纪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叶德辉《书林清话》等,互为参照,必能对苏州的藏书历史和文化乃至整个中国的藏书历史和文化有更全面和丰富的了解。

(来稿时间:2017年7月)

参考文献:

1. 叶瑞宝. 苏州藏书史 [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1
2. 曹培根. 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 [M]. 扬州:广陵书社, 2017:1
3. 江庆柏. 近代江苏藏书研究 [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16
4. 曹培根. 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 [M]. 扬州:广陵书社, 2017:19
5. 顾广圻, 王欣夫. 顾千里集 [M]. 北京:中华书局, 2007:331
6. 黄裳. 春夜随笔 [M]. 成都:成都出版社, 1994:78-81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rosperity in Wu Area, and Nowadays There are a Galaxy of Talents There: from Book Collection History in Suzhou to Research on Book Collec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of Suzhou

Zhang Siyao

(Library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knowledge connotation and academic value of the two books by comparing “Book Collection History in Suzhou” edited by Ye Ruibao and “Research on Book Collec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of Suzhou” by Cao Peigen,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two books is the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the glorious achievement of book collection culture in Suzhou and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on promotion the collecting books culture of Suzhou.

[Keywords] Private book collection in Suzhou Book collection culture Book Collection History in Suzhou Research on Book Collec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of Suzhou

[作者简介] 张思瑶(1988—),女,南京大学管理学硕士,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研究方向:阅读推广。